

上海研究丛刊

第5辑

程 洪：上海研究的方法论

陈旭麓：论史与志

张济顺：近代上海社会史界说

高洪兴：近代上海的同乡组织

来新夏：有关上海的几种清人笔记

许敏：淞沪战役述评

黄岸青：陈其美与沪军都督府

P.C.213.19

K295.1
23
7·5

PAPERS ON SHANGHAI STUDIES

上海研究论丛

第五辑

主编 洪 泽

副主编 吴云溥

曹宪镛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 742753

责任编辑 朱 弘
封面设计 范一辛

《上海研究论丛》第五辑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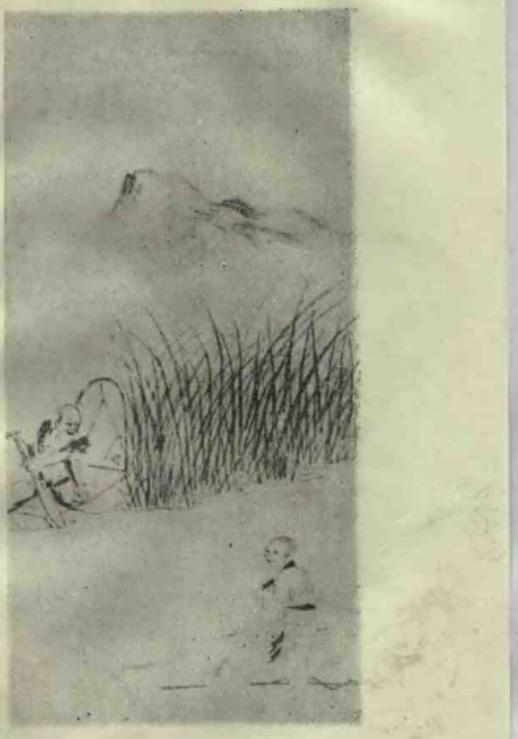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印张 9.75 字数 240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80515—595—X/Z·32

定价: 5.00元



目 录

· 上海研究导论 ·

-
- | | |
|--------------------|----------|
| 上海研究的方法论..... | 程 洪 (1) |
| 论史与志..... | 陈旭麓 (16) |
| 科学的地方志：从现象到本质..... | 吴云溥 (20) |
| 谭其骧与上海史研究..... | 葛剑雄 (27) |
| 我们为什么写《上海史》..... | 唐振常 (38) |
| 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 | 张济顺 (42) |

· 专题研究 ·

-
- | | |
|---------------------------|-----------|
| 远古时代上海历史试探..... | 黄宣佩 (56) |
| 明清时期上海邑城的社会经济结构探索..... | 吴仁安 (66) |
| 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 | 徐鼎新 (79) |
| 近代上海的同乡组织..... | 高洪兴 (114) |
| 二十世纪初期青帮在上海郊县的活动..... | 邵 雍 (163) |
| 简论上海近代报刊与资产阶级革命活动..... | 何平立 (167) |
| 淞沪战役述评..... | 余子道 (178) |

· 上海人物 ·

-
- | | |
|-----------------|------------|
| 徐霖研究..... | 邓长风 (213) |
| 王韬与墨海书馆..... | 忻 平 (229) |
| 陈其美与沪军都督府..... | 黄岸青 (235) |
| 实业家刘鸿生..... | 许 敏 (243) |
| 我记忆中的夏丐尊先生..... | 欧阳文彬 (260) |

• 史料选萃 •

-
- 《群众日报》社论、论文选录(二) 姜义华 辑 (277)
有关上海的几种清人笔记 来新夏 (293)
新发现的上海文献 文 操 (301)
-
- 编后 (307)
-

上海研究的方法论*

程 洪

与一切历史研究一样，地方史研究有赖于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方法和方法论的更新，通常成为历史学研究划时代的标志。作为一种地方史研究，上海研究也经历了它的古代时期与近代时期（分界线当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左右），其间的转折正是由方法和方法论的飞跃而体现。现在，上海研究在长期沉寂之后复兴，它会是继续因袭传统，还是通过方法和方法论的新的飞跃而进入它的现代时期？

新的历史研究（包括地方史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出发点在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人民大众是怎样经历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并作出了何种选择？这句话十分鲜明地点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人民大众）和客体（社会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基本问题，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首肯，也得到了众多现代史学流派的认同和关注。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现代史学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重要特征。显然，它也应当在上海研究中得到反映。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兴起的大都市，固然有着与其他地区相似的发展历程，然更有其特殊的方向。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甚至可以上溯到宋明以来的社会变动），孕育着上海的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黄宗智先生多次讨论，并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诞生和发展。没有这样的结构性变动，就不会有今日之上海。在这一进程中，人民群众经历了社会大变动，并通过他们的抉择进而影响社会大变动。如果上海研究不能充分地反映和认识这些基本方面，而停留于收集地方掌故、编纂名人轶事、绘制统计图表，便只会得其皮毛而丧其魂魄。这样的研究，决称不上现代的上海研究，它会把一个动态的上海描绘成一个静态的上海，会把一个活的上海变成一个死的上海。

一、上海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回顾

历史研究方法论，通常基于一个时代所能达到的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水平。历史研究划时代的变革，往往体现于方法和方法论的更新；在更深的意义上，正是反映了历史观的飞跃。诚然，这样的变革、更新和飞跃，并不意味着与过去传统的截然分割，而是在吸收过去研究合理因素基础上的质的升华。因此，在历史研究方法论的现代化过程中，决不全盘否定以往的方法和方法论，而必须认真学习、研究这些宝贵的学术遗产。

（一）上海研究方法论的古代时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上海研究，是它的古代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特色，是以编纂地方史志为主体，描述上海地区（以松江府为主体）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吏治宦绩、物产文化等。这样的研究首先是地方官致仕的记录，再就是伦理观念的乡土化。地方志的编纂通常由地方行政长官在名义上主持，实际是以地方乡绅为主体；因此在方法和方法论上反映出相应的特点。

首先，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地方的行政沿革过程：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频繁，而一般历史文献中缺乏对地方基层行政区划的记载。上海地区自宋以来近千年中，行政区划变动很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史志则提供了详尽的变化经过；同时，地方镇市的兴衰、地理环境的变迁、耕地面积与地方税收的增减往往也有具体

的反映。

其次，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社会的风土人情。如果说地方行政、财政等方面记载有相当部分抄自官方数字或其他方志的话，反映社会风俗习惯、方言等方面的内容则往往取材于当地的实际状况，且很难见诸其他历史文献。

再其次，比较直接地接触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变化过程。如上海地区的乌泥泾镇，如何在元代随着棉纺织技术的推广而兴盛，但在明清时期棉纺织业在上海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后，乌泥泾镇反见衰落了。又如黄浦江水道对沿江农村经济的影响等等。这些内容均很罕在其他历史记载中体现。

还有，比较丰富地保存了地方掌故和名人轶闻。这些内容往往是为了宣扬伦理教化，但是从中仍可触到社会变化的脉搏。从一些不见于其他历史记载的小人物身上，虽然这些小人物以隐士、节妇、烈女身份出现而不同于一般民众，仍可看到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子。

这一时期的上海研究，还应包括不少不以地方史志形式出现的著行，如以文书形式存世的清代李鼎的《浦泖衣香》、褚华的《本格谱》，以笔记形式出现的明代李绍文的《云间杂识》、清代叶梦珠的《阅世编》等等，从中可以更直接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反映了一般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状况。这一时期大量存在的文集、诗词、民间歌谣等，均从不同程度反映了上海地区的发展历程，但这些本身不一定成为上海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作为上海研究的历史资料而为后人所利用。

总之，这一时期的上海研究，在方法和方法论上仍沿袭了历代史学研究的传统，以志和传为主体，辅以纪年和记事，其要点仍在宣扬地方政绩和伦理教化。我们可以用一个“录”字来概括其方法和方法论的特点，无论是记录，还是抄录，无非是要用文字保存作者认为重要的历史过程。

(二) 上海研究方法论的近代时期

就上海研究而言，并没有随着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而马上开始它的近代化过程。直至民国初年，上海研究仍遵循着它的传统方式。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这一状况开始变化。近代上海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要求上海研究能够反映这一现实，并为经济、政治的进一步拓展提供基础研究。同时，上海又是外国在华势力的总据点，也是中外文化的汇集点。社会的这一深刻变化决定了上海研究没有必要再去宣扬中国地方当局的成绩，也不可能继续使用中西传统的伦理道德来衡量社会。因此，在上海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产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地方史志编纂的近代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方史志虽然在形式上沿袭了志、传体例，但在内容上却增加了实业志、农业志、商业志、学校志等反映近代经济、文化活动的记载，并运用近代统计的方法表现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

其次是关于地方统计年鉴的编纂。这是地方史志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把统计资料从地方史志中独立出来，摒弃地方史志中的人文风俗、人物传记部分，这是整个社会进一步物质化的结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各种有关上海的年鉴相继问世，如《上海市年鉴》、《申报年鉴》、《申报上海市民手册》、《金山县鉴》等。其他政府或民间系统编制的《上海市统计总报告》、《上海市统计》等也属于此类。这些年鉴上要包括统计资料和人事记载，反映了上海研究的近代特征。

再其次是都市史研究发端。中国农村地区长期是社会发展的主体，随着近代化进程，在上海地区首先形成了大都市占主导地位的格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研究实现了以农村为中心向以城市为中心的转向。随着这一转向，县志、镇志及各种乡土志不再在上海研究中占主要地位，而对上海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分门别类的专门化研究成为上海研究的主要形式。

还有，地方研究的学术化。以上海通志馆为代表的上海研究内容包括多方面，有对历史掌故的勘研，有对历史人物的追忆，也有对历史事件、组织的探讨。在基本方法和方法论上，这些研究已经脱离了传统的为统治者作“梦”和宣扬伦理教化的色彩，反映出近代学术研究的特点。

更值得引人注目的，是近代社会调查的方式开始进入上海研究。这种社会调查方式，最初来自西方社会学领域。二十年代中期，卜凯主持了金陵大学的社会调查工作，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和土地利用的调查报告，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三十年代，上海经济调查所成为上海研究的一支生力军，许多调查报告揭开了上海近代社会的各个侧面。如该所的《上海米市调查》和该所羊冀成关于松江米市的两个调查，直接涉及了上海基层社会的现实问题。三十年代末期至四十年代初期，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组织了对长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其中包括对松江县的调查。尽管这一调查带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目的，但在调查中直接反映了具体的农户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他们对社会的态度。类似的、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状况的报告还大量地保存在这一时期的各种档案材料中。

近代上海研究的显著特点是重视社会的物质结构。这是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一些研究中涉及到社会基层，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是漠视人民大众的。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就是“列”。这一时期的研究运用近代的学术方法列出了社会各个侧面的基本情况，但缺乏对本质的认识和分析。

（二）上海研究方法论的转折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研究在一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有了崭新的面貌。从方法论和方法论

方面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特色。

首先，上海研究的理论色彩得到加强，社会结构的质的分析引起了普遍重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上海社会的阶级结构、帝国主义与上海近代化的关系、中国资本主义的内部结构等课题，均在研究中有所突破。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在政治史方面有对帝国主义与上海租界的研究，对从太平天国、小刀会到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解放前夕爱国民主运动的研究。在经济史方面，通过点（企业史）、线（行业史）、面（工业史、商业史等）的结合，涌现了一批学术质量很高的著作，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专门性的综合研究，还出版了一批关于上海企业、钱庄、物价等方面的研究资料集。

其次，人民群众也成为上海研究的对象。从上海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到上海市民的生活状况等，均成为上海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社会基层组织的一些研究，大至乡志、镇志，小至企业史、商店史、校史也得以问世。除了专业研究人员之外，各大公司、大企业、大学均建立了研究本单位历史的机构。

再其次，重视了政策抉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上海研究中，十分重视政治的作用，即使是关于社会经济的研究，也往往与政策相联系。许多研究直接服务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

由于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影响，上海研究虽开始迈向现代化，但举步迟缓，在相当长时期内甚至陷于停顿。这一时期虽出现了不少很有学术份量的上海研究论著，同时也出现了以政治说教取代客观的历史分析的倾向。在分析社会的结构性变动时，夸大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地位，忽视了新的生产力；曲解了新的生产关系，否认了人口运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把一切纳入两条路线斗争的轨道。在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同时，继续忽视人民大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以少数领袖人物代替广大的普通人民，实际上仍沿袭了把帝王将相作为历史

研究主要对象的传统。对一般工人和市民的日常生活，缺乏基本的了解；对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及市民的社会作用，在掌握资料上落后于对帝国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的研究。一些统计数字与社会调查也成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牺牲品，而丧失其真实性。这些均给上海研究带来很大破坏，以致人们很难从学术角度大评估它的方法或方法论。

上述正面的及反面的特点表明，“论”是这一时期上海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标志。“论”，既反映了理论上的发展和运用，也反映了“以论代史”的错误倾向。在长时期内，上海研究并未进入它的现代的、科学的时期。

改革与开放给上海研究带来生机。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上海研究又开始进入高潮。由于上海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上海研究也引起了国际同行越来越广泛的兴趣。在长时期的中断之后，上海研究终于又继续了它的现代化进程。

上海研究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虽然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历史发展本身。上海研究经历了它的古代时期、近代时期，为它进入现代时期提供了基础。然而，上海研究在古代时期、近代时期总的特点是静态的研究、孤立的研究、单一的研究、上层的研究和形而上学的研究；这样的方法和方法论不能满足今日上海研究的需要。因此，在继承以往一切研究成果的同时，上海研究应当在方法和方法论上有质的飞跃，这种飞跃必然地建筑于对社会发展的新的认识基础之上。

二、上海研究方法论的两大要素

现代史学研究方法论的出发点，或者说它的基础，是如何正确地看待社会发展过程。与古代时期比较，它同样重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作用，但这里的人决不限于古代地方史志所局限的官绅阶层，而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民大众，普通的农民、

工人和小市民。与近代时期比较，它也同样重视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计，但这样的统计不再成为一堆枯燥的数据，而是要反映社会的结构变动。因此，现代方法论吸取和继承了过去的一切精华，而面对它所要回答的问题：人民大众是怎样经历社会的大的结构性变动，并作出了怎样的抉择？概言之，现代方法论的基础就是在探寻结构与抉择的关系，即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大众）与客体（社会）的辩证关系。

从上海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两次变革以及伴随着的人口移动高潮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就是社会的大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带来的反响。

首先是以棉种植业和棉纺织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在宋代以前，当今上海地区的大部分并不属于经济发达、人口繁盛的地区。真正的发展是随着植棉技术的推广、棉纺织技术的普及而到来的。棉花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上海中部、北部和东部地区的迅速发展，移民大量增加。松江府在宋元以后沙土地带不断得到开发，人口亦由此增加，于是在元至元年间正式升为府，明朝时期更进一步在辖区内分设新县，逐步形成了现今的行政格局。在棉种植业和棉纺织业的带动下，上海地区形成了一批专业性市镇，建立了市场网络，并在这样的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塑造出本地区的文化特色。可见，在这一大的结构性变动中，棉花经济的发展是先河，随之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业市镇的兴起，而人口运动则是对这一结构性变动的反映和抉择，随着劳动力专业化分工的形成，社会结构的变动得到巩固，而其他一切政治的、文化的变化发展均离不开这一大的背景。

工业革命给上海带来了意义更为深远的结构性变动。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上海地区占主导地位，随着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兴起，旧的经济体系迅速地为新的结构所取代，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开始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

配。新的人口运动高潮随着这一结构性变动而到来，社会各阶层所占的比重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知识阶层、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力量接踵而起，把社会变革不断推向前进。由于上海在近代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处于震中位置，由于上海的社会各阶层在社会变革中所取的态度最具代表性，上海的影响摆脱了地区的局限，而作用于整个近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和经济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近代文化的海派特色。

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和人民群众在这一变动中的抉择，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大要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高度重视社会结构，从生产方式到上层建筑，从经济关系到阶级意识，都体现了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分析。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新陈代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从来就高度重视人民大众的抉择，这种抉择并不由一两个或少数领袖人物的意志所代表，革命运动只有放到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和人民大众的抉择之中，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历史含义。这两大要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出发点。同时，这两大要素又为各现代史学流派所关注，尽管各自的侧重点不同。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从哲学角度分别强调了两大要素。在历史研究领域，来自经济学的流派力图把社会结构的变动量化，运用先进的电子计算技术，表现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传统的社会学流派也注重社会结构，但一种新的潮流则强调抉择，主张回复到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通过对社会现象的直接考察，认识社会如何自下而上地变化。显然，现代的研究方法不应排斥任何学派的合理因素，而通过博采众长，综合研究，辩证地认识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和人民大众在这一变动中的抉择两大要素之间的关系，把上海研究推向新的水平。

三、上海研究方法论的现代特征

从总体讲，新的上海研究不应排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

法，也肯定任何一个研究侧面在整体研究中的作用。因此，现代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基本特征就是综合、整体、基层、动态和综合的研究。

（一）综合的研究

综合的研究意味着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任務，甚至不仅仅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任務，而要开展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研究。

上海的发展有其地理的、生态的和生物的前提。如果不了解上海地区的地理环境（河道、土壤的分布），如果不了解作物的习性（如棉花的习性），也许就无法理解松江府棉花经济的发展。同样，如果不考虑地理因素，既无法理解近代中国的外贸中心由南（广州）向北（上海）的转移，也无法理解上海的商业重心由南（南市）向北（北市）的转移。而地理条件又不能孤立地说明问题，上海临江靠海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并未有大的变化，只有动力航远业兴起后才有了新的意义。

人口运动通常是城市化过程的动力。无论是松江府棉花经济的发展，还是上海的工业革命，均发端于移民。人口的增加和移民的发生是人口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而上海地区的移民运动又无法仅依靠人口学来说明。

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固然需要经济学探讨其发展的规律，而这种发展显然不仅仅受制于经济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与三十年代前期，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大的时期，这又非借重政治史、军事史的研究不可。政策是抉择的一种表现，政策的正确与否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政治学并非无用武之地。同样，对历次革命运动的研究，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也具有重大的价值。

社会掌故、名人轶闻，作为社会信息的一个方面，自有其研究的价值。现代研究并不期待以某种特定的方法去取代其他方法，

相反，它充分肯定和提倡多种研究方法，反对单一角度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多层次地展示社会结构与抉择这两大要素，这就是现代研究的综合性。

（二）整体的研究

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并不意味着各学科的各自为政。现代研究与古代、近代的区别之一，并不在于古代的、近代的研究方法没有众多的学术领域，而在于这些领域是相互有机联系的，还是相互孤立的。这种整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大的方面而言，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多种因素之间的作用力，可以相互抵消，也可以相互加强，可以改变发展的方向，也可以影响变化的速度。片面强调自己研究的决定意义，而无视其他研究的成果，不是现代研究的科学态度，也是许多研究长期处于争论不休的原因。

就小的方面来说，每一个具体微观的研究又必须自觉地置于宏观研究之中。我们可以为探寻某个掌故，或为发现某项轶闻趣事乐道，但如果把这些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这样的研究成果会没有生命力，会为历史所遗忘。现代研究决不轻视考据，但考据只有与整体研究相联系，它的价值才能体现。在生产劳动中，并非投入越多劳动的产品一定是越有价值的，只有这种劳动能为社会承认，能转化为社会劳动时，它的价值才能体现，在历史研究中也是这样。当然，这里的社会劳动并非指能卖钱，而是表示它能在社会的系统研究中说明问题。

综合的研究主张承认他人，整体的研究主张溶化自己。这些说明现代研究应当脱离劳动者个体经营的手工业阶段，而进入有组织的大工业时期了。

（三）基层的研究

现代研究并不排斥对上层的研究，但它更强调对基层的研究，并以此作为区别于以往研究的基本特征。